

唐崔郾墓志考释^{*}

毛阳光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近年来河南偃师出土的崔郾墓志较为详细记载了这位唐后期宰相的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经历等情况, 于文宗、武宗两朝史事多所关涉, 尤其是其在宣歙、巴蜀、淮南等地区的仕宦经历以及政绩多能反映唐后期区域经济与社会状况, 补充了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 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关键词: 唐朝; 崔郾; 墓志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4-0068-07

唐后期宰相崔郾墓志 2006 年出土于洛阳偃师, 墓志石灰岩质, 方形, 边长 80 厘米, 志文楷书, 四煞为十二生肖纹饰, 志盖未见。后墓志归洛阳私人收藏。崔郾其人唐文宗、武宗时期为相, 《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六三有传, 然本传甚为简略, 而墓志近 2100 字, 记载其家世、登科、仕宦经历极为详尽, 多能补正史之阙。且两《唐书》中对于崔郾在地方担任节度使的情况记载极为简略。而墓志记载其节度地方的政绩非常详细, 对于了解唐后期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价值, 充分体现出新出土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何汉儒《唐崔郾志探微》最先刊布此方墓志并进行了初步研究。^[1]遗憾的是, 何文征引文献资料局限于两《唐书》, 相关考证和研究也较为疏略和粗糙。因此, 这里笔者依据墓志内容, 结合文献资料, 对该志再做考释和探讨, 庶几有所发明。墓志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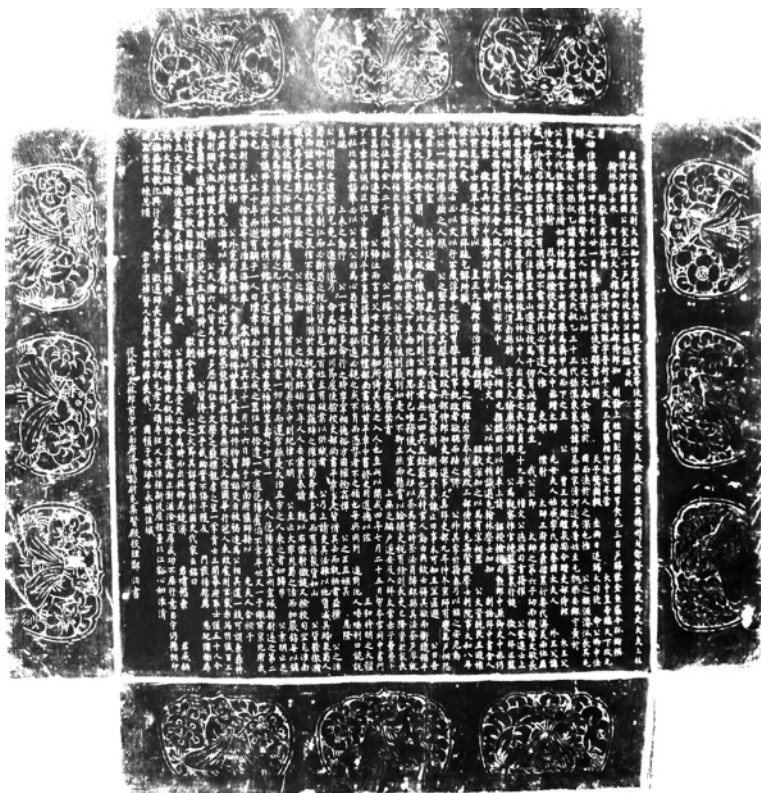
唐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徒崔公墓志铭并序

翰林学士承旨正议大夫权知尚书兵部侍郎知

制诰上柱国彭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令狐绯撰

唐昭献皇帝得贤相, 清河公讳郾, 字晋封, 平大政三载, 罢相印后七年, 当大中皇帝临天下, 改元之始, 作镇淮海。四年七月廿一日薨于治所, 监军使者驿书以闻, 天子惊痾, 辍坐两日。追锡大司徒, 命公卿申法赙, 侍臣持节礼册, 贤士正人相吊哭, 有以知公之大忠全德, 许于国而决于人之深也。惟公之族, 源浚派长。其先实姜姓, 齐太公孙叔乙让国居崔, 因而受氏。叔乙三十三代孙汉东莱侯讳伯基, 始家清河, 遂为著姓。至元魏乐安郡守夤, 于公为九代祖。华宗清绪, 如椅梧麟凤, 言士阀者举为鼎甲。顺而下之, 至公曾王父综, 醴泉县令, 赠吏部侍郎。大王父佶, 太子中允, 赠左仆射。烈考陞, 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赠太师。先母夫人姑臧李氏, 赠秦国太夫人。外王父讳咸一, 汾州司仓参军, 《传》云: 有明德而不当世, 其后必有达人。惟吏部、仆射、太师三府君秉哲累行, 弈代济美, 而位屈于时, 甚郁必发, 如灵泉回湫, 出注万里, 名山逶迤, 拔为千仞, 育此瑞气而生我公。公即太师之第六子。幼而机警文敏, 长而姿度秀异, 人望之为龙章凤质, 琼树瑶林, 真神仙中人, 出风尘之表矣。贞元十九年, 权文公德舆司贡籍, 擢公登进士上第, 调补秘书省正字, 再调以书判入高等, 授渭南尉。李大夫脩廉浙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10BZS016) 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新见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2009-JD-011) 前期成果。



图一 崔郾墓志拓片

右，辟公为观察推官，授监察里行，旋征入。拜正监察，转左补阙，迁起居舍人，改司勋员外郎、刑部郎中。杜相国元颖镇西川，以副车上请，诏授检校司勋郎中兼御史中丞，仍赐金紫，征为兵部郎中，转考功郎中。时昭献好文，公以雄文精识，选充翰林学士，加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依前充学士，视草之余，常以皇王大端，邦国治道膺顾问。昭献深知之，以为有宰相器。公天资兢畏，且避权幸，不欲久处奥密，累拜疏乞解所职，昭献弗之强，俾出守本官，旋改工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大和八年，拜礼部侍郎，选士必以文以行，不惑浮华之说。时有嬖臣用事，执政者欲昵而结之，俾公升其季于籍，奏乃以族之安危动公，公一无所惧而绌之，人服公之坚正。未几，其嬖果败。改兵部侍郎，知吏部选事，又真拜吏部。九年仲冬，京师有变，万户恟恐，廷臣多跼伏私室。公时近钟，同气之戚方在，宁令遽命促驾，奔问朝谒。子弟谏止曰：事未可知，且宜匿避。公曰：吾已为大臣矣，安有闻朝之大故而怀私耶？比及列，则公卿至者无三四。其主铨核也，度材官人，动由典故，士得其欲而衡镜称平。出为宣歙观察使，兼御史大

夫。瞻风而畏爱，下车而化治。罔思封己，唯务便人。宣之氓以茶为业，时茶法甫归郡县，其法茶户率就官造茶，官给帖出卖。或有贫民赀铢两无公帖者皆被刑，严刻如是，人不聊生，然而悬赏以给捕吏。税有余，则长吏已降资于家，长吏往往至合入二千万钱于私。公一缙不受，乃为废捕吏，弛旧禁，贡上无乏，编户遂安。及入拜太常，赤子累累千百万徒，拥轳遮路，望公号泣而言曰：父母去矣！莫知所倚。其惠之入人也至此。以开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而正位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复兼礼部尚书，依前平章中书修史。用道德以佐王，弘将明之大体。无私比，无虚诺，举必以公是公非为心，苟贤者虽孤远必亲之，或不肖而凭势者不之顾也。每与同列进对，他人喋喋利口，诡说万端，上未之动。但公一言之蔽，多命行之。时

李宰相德裕方固权稔奸，惮公之正，且嫉其恩隆。公以明哲之道，坚词乞免，三进方遂，乃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人皆惜其去而执柄者益横。公之治蜀，政令明具，宽而有制，仁而必断。蜀之税法，皆征见缗，百姓至有破业以供赋者。公乃上请更其法，杂以他货，减其缗泉，蜀人便而谣之。抚馭两蕃，使之畏信不敢窥境。前帅溺于巫祝，广置淫祠，窃帅之权，倾蜀奔奉，多因而有得，聚货如山。公皆发撤渚坏，戮辱窜弃，蜀人然后益敬公之德，知公之政矣。终始六年，人人安业。累表请觐，以右仆射征，旋又检校司空，充淮南节度使。轻扬之俗，水陆所会，产饶人逸，号为难制。前后帅或刚柔失中，则纪律不明。公至止大率用蜀之治，而加严飭，每以铲弊流惠为事，淮滨之人乐而惧之。凡纷华盛丽，目为供使者一切斥而还官，繇是大治，五方之人来之者如归市。公素明止足之志，方议拜章，期于得谢，奄捐公馆，岂大运耶？自淮达海，若丧怙恃，享寿七十有一。夫人范阳卢氏，宣州宣城县尉邈之第二女。先公三十年而逝，有嗣子一人曰璞，孝悌而而文，有大成之器，任左拾遗。一女，适范阳卢滔，不幸

早世。又一子璲，前京兆府武功县尉，亦克谨守。拾遗等自淮至洛，号奉裳帷。郾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归于河南府偃师县，以先夫人合祔于先茔之次，礼也！惟公外宽内严，出忠入孝，居常俨恪，如奉大祭，未始忤物，曾无谄笑。自被褐迨为公相，其道一致，可谓秉彝特立君子矣。所至府藏充溢，唯以上庆助朝廷，下拯救蒸黎为务，无枉费，无贿交。文擅国华，行冠人表。故处则玄衮赤舄，羽仪百工，动则琚戈淑旂，临长万旅。公天伦六人，皆为名卿，多历显位，号文学之藪，标龙虎之望。一掌贡士，三开幕府，取士仅五十人，今布台阁者过半，率当时峻髦。《洪范》之五福，《商诗》之百禄，公皆得之宜乎哉。绌实不佞，早获及门，发扬慰荐，恩纪备极，辱拾遗之命，论撰不敢固辞，且惧寡陋，有阙徽懿，今第举公之大节，其详当传于国史代家云。铭曰：

营丘大道，让德流庆。毓美储休，及公而盛。公禀灵气，受天正命。为时而出，与物为镜。济君嗜欲，秉君威柄。扶拱大厦，经纶帝图。苍生赖倚，皇极吁谟。彝伦光叙，殊俗式孚。霖雨正澍，渥洽逾厚。成功不居，行意自守。仍悬相印，且抚益部。教化兴行，吏民舞手。征还师长，重复仪形。方叔元老，又烦专征。义其保强，新彼度程。量比江豁，心如淮清。明王思佐，巨栋忽倾。当宁深悼，贤人失声。奄兹邦瘁，丧我国祚。于嗟琢石，永识佳城！

从外甥文林郎前守河南府洛阳县尉充集贤殿校理郑洎书

据墓志记载，崔郾字晋封，新旧《唐书·崔郾传》均失载，可补入。关于崔氏家族的源起，墓志称“齐太公孙叔乙让国居崔，因而受氏”。《元和姓纂》卷三也记载“齐太公生丁公汲，生叔乙，让国居崔邑，因氏焉”。^[2]与墓志记载相同，而且更为详细。而《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却记载“齐丁公汲嫡子季子让国叔乙，食采於崔，遂为崔氏”。^[3]关于中古时期崔氏的源起，古代文献资料记载多不相同，尤其是墓志中的描述更是多样，学者多有指出。^[4]甚至于刘禹锡为崔郾父亲崔陞撰写的神道碑记载“太公望既封于营丘，子汲嗣侯。汲之孙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为氏”。^[5]与崔郾墓志记载也不相

同。夏炎从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的角度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认为《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较为可信，而《姓纂》的记载缺乏可信度。^[6]笔者在这里无意评判古人关于崔氏源起记载的是与非。墓志记载说明了《元和姓纂》中崔氏源起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崔郾出身中古清河大族，墓志中其先世的描述当出自崔氏家族谱牒，而林宝的《元和姓纂》也是当时知名的搢绅姓氏录，二者的记载应是当日社会对于崔氏源起较为普遍的认识。

关于崔郾的父祖，墓志称“曾王父综，醴泉县令，赠吏部侍郎。大王父佶，太子中允，赠左仆射。烈考陞，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赠太师”。与《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记载相同。而《旧唐书·崔郾传》却记载“祖结，父倕，官卑”。^[7]《新唐书·崔郾传》称“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8]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注》卷二据杜牧《崔郾行状》以及刘禹锡《崔陞神道碑》已证明两唐书《崔郾传》其祖、父名之误。^[9]墓志记载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科第方面，崔郾在贞元十九年进士中第，对此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一五贞元十九年失载，可补入。中进士之后，崔郾任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正字虽然在品级上仅仅是从九品上阶，但在唐代却是公认升迁迅捷、有前途的官职。此后，“再调以书判入高等，授渭南县尉。”这是指崔郾参加了吏部主持科目选中的平判入等，科目选是唐后期贡举及第者经常参加的铨选，尤其是在德宗贞元年间，许多进士、明经及第者参加科目选登科后都能得到较快的升迁，而后步入高官的行列。^[10]而通过科目选的崔郾被授予渭南县尉。渭南是隶属于京兆府的畿县，在唐代诸县中的地位仅次于长安和万年二县，地位非常重要。而渭南县尉这样的畿县尉是非常有前途的官职，是当时士人向往的美职。^[11]

而后，崔郾被浙东观察使李翊辟为观察推官，授监察御史里行。但不久他就入朝为监察御史，之后转左补阙，迁起居舍人，又历任司勋员外郎、刑部郎中。对此，两《唐书》仅提及崔郾曾任监察御史以及刑部郎中，其余均失载。其中，《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八《司勋员外郎》下有崔郾题名。^[12]岑仲勉据此考订崔郾在唐穆宗、敬宗年间曾任此官。^[13]崔郾又曾以检校

司勋郎中兼御史中丞的身份辅佐杜元颖入川。之后又入朝为兵部郎中，转考功郎中。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崔郾以考功郎中充翰林学士、知制诰，之后又拜中书舍人，仍充翰林学士。在此期间，崔郾备文宗顾问，受到文宗的赏识。大和六年（832年），崔郾罢翰林学士。^[14]据墓志，很快由考功郎中转工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大和八年（834年），崔郾任礼部侍郎。《旧唐书·崔郾传》载“八年，为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权知礼部。”史书中崔郾任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时间有误，当在大和八年之前。唐制，礼部侍郎司贡举，这期间，他公正无私，选拔得人。墓志称“取士仅五十人，今布台阁者过半，率当时峻髦”。许多人其后都成为朝廷股肱之臣。此后崔郾又任兵部侍郎，知吏部选事，后又任吏部侍郎。在任内主持官吏铨选清正公平，因此墓志称“度材官人，动由典故，士得其欲而衡镜称平”。

文宗大和九年十月，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之变”，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失败。当时，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疯狂杀戮公卿大臣，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被杀。对此，墓志中也记载了当时朝廷的恐怖气氛，“九年仲冬，京师有变，万户恟恐，廷臣多跼伏私室。”而此时的吏部侍郎崔郾，临危不乱，“公时近钟，同气之戚方在，宁令遽命促驾，奔问朝谒。子弟谏止曰：事未可知，且宜匿避。公曰：吾已为大臣矣，安有闻朝之大故而怀私耶！比及列，则公卿至者无三四。”危难之后毅然上朝，体现出不畏强权的淡定心态。

此后，崔郾出为宣歙观察使。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五六，崔郾在开成二年至四年任宣歙观察使。墓志记载，在宣歙任上，“宣之氓以茶为业，时茶法甫归郡县，其法茶户率就官造茶，官给帖出卖。或有贫民赀铢两无公帖者皆被刑，严刻如是，人不聊生，然而悬赏已给捕吏。”这里涉及到唐文宗时期唐政府茶法的几次重要的变革。在唐代，饮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风气，而茶税也成为唐后期税收的来源之一。最初，唐政府在茶法上采用向商人征税的方式，茶税由盐铁使掌管。到了文宗大和九年，宰相王涯改革茶法，实行榷茶，“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使茶山之人移植根

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实行官产官销的专卖，导致民怨沸腾。^[15]此年的十二月，王涯在甘露之变中被杀，令狐楚变革茶法，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茶法改由地方州县负责管理。开成元年（836年）四月，新上任的盐铁使李石“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有学者认为李石改变了令狐楚将茶法下放州县管理的办法，恢复贞元时期盐铁使掌管的旧制。^[17]而墓志称“时茶法甫归郡县”，这表明此时茶法还是由地方掌管的。这一点在文献中也能得到印证，开成二年（837年）九月，浙西观察使卢商奏称“当州自开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以茶务委州县，……”^[18]另外，关于开成年间唐政府实行税茶还是榷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张泽咸认为唐政府对茶叶实行了专卖，即榷茶；^[19]陈衍德认为此时的茶法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局部专卖方式，茶商自地方政府手中以官价购得茶叶，然后加价贩卖四方。^[20]黄纯艳认为此后的茶法是征收专卖税的间接专卖制，允许园户与商人直接交易，官府间接垄断茶叶收购环节。^[21]孙洪升、李锦绣等学者认为此时仅仅是税茶，并没有实行榷茶的专卖制度。^[22]而墓志提供了这一时期地方州县茶法实行的珍贵资料，“茶户率就官造茶，官给帖出卖。”即从事茶叶生产的茶户必须在地方官府规定的茶园制作茶叶，这一点与大和九年王涯主持榷茶时“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颇有几分类似。可见，王涯实行榷茶时的一些措施在开成年间还在使用，地方茶业的生产还是由地方州县严格控制。但官府不再收购茶户的茶叶进行销售，而是通过向茶户发放公帖的方式来管理茶叶贸易，茶户取得公帖后才可以向商人出售茶叶。这是一种间接的专卖，因而这一时期茶法是实行专卖制度的。而一些百姓由于没有公帖而私下出售少量茶叶，因此遭到官府的严惩。可见当时官府对于私售茶叶监察非常严厉，而参与缉拿百姓的官吏得到奖赏。另外，“税有余，则长吏已降资于家，长吏往往至合入二千万钱于私。”税收方面的盈余，地方长官以下都从中得到好处，长官甚至将二千万钱茶税收入私囊。而崔郾到任后，清正廉洁，并改革地方税茶方面的弊政，“公一缗不受，乃为废捕吏，弛旧禁，贡上无乏，编户遂安。”针对地方茶法实行中存在的弊端，开成四年（839年）二

月，崔郾还上书朝廷，“茶法非便于人，请两税钱上随贯纽率。”建议政府在征收茶户两税时还征缴茶税。^[23]尽管此建议被唐中央政府否决，但表现出崔郾在解民于倒悬方面的努力。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地方州县茶叶专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开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后，十月就“诏复茶税”。^[24]

由于在宣歙任上政绩突出，崔郾被征召入朝为太常卿，太常卿在唐代是九卿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其职务属于清望官。开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崔郾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其宰相生涯，之后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兼礼部尚书。据墓志记载，为相期间，崔郾忠于职守。“无私比，无虚诺，举必以公是公非为心，苟贤者虽孤远必亲之，或不肖而凭势者不之顾也。每与同列进对，他人喋喋利口，诡说万端，上未之动。伧公一言之蔽，多命行之。”两年后，会昌元年十一月，崔郾罢相，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两《唐书》并未明言崔郾罢相原因，据墓志记载，“时李宰相德裕方固权稔奸，惮公之正，且嫉其恩隆。公以明哲之道，坚词乞免，三进方遂，乃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人皆惜其去而执柄者益横。”按照墓志的说法，是时同为宰执的李德裕忌惮崔郾的公正，而崔郾则明哲保身，多次上书请辞。然而，《旧唐书·崔郾传》却记载“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郾弟兄素善”。墓志说法与史书记载不同，墓志撰文者令狐绹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的领军人物，对李德裕有所诋毁在所难免。而从李、崔二人的性格来看，李德裕个性张扬，嫉恶如仇，以天下为己任。而崔郾老成持重，明于进退之道，不愿意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之前就曾请辞地位颇为重要的翰林学士。因此，二人性格差异是比较大的。李德裕是开成五年九月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郾会昌元年十一月即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样二人共事仅一年有余，如果说关系融洽的话，崔郾就不会五次三番的上表请辞，也不会如此快的去职。因此《旧唐书·崔郾传》中李德裕、崔郾二人的关系记载是有疑问的。

墓志记载，崔郾镇蜀期间，政绩颇为突出，“蜀之税法，皆征见缗，百姓至有破业以供赋者。”唐德宗建中元年唐政府进行了税制改革，实行两税法。两税在征收中分为斛斗和两税钱两

部分，百姓在实际缴税两税钱时多由绢帛等实物来折纳完成。^[25]然而，此时蜀地税钱部分并不折纳绢帛，而是征收现钱。其原因据会昌五年《南郊赦文》云“如闻西川税租，尽纳见钱。盖缘人多伎巧，物皆纤粗，凡所织作，不任军资。所以人转困穷，俗增侈靡”。^[26]尽管唐代巴蜀地区的丝织业非常发达，许多州都出产高级的丝绸。但由于当地百姓将织造粗陋的绢作为两税缴纳，这些次品无法作为政府供军之用。因此，朝廷才命令当地百姓缴纳现钱完税。但是，由于唐后期钱重货轻的情况日益严重，以现钱完税迫使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劳动产品去获取钱币，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有鉴于此，崔郾“公乃上请更其法，杂以他货，减其缗泉”。这应该就是指会昌五年（845年），朝廷令巴蜀地区“委刺史与县令商量，劝课有机杼之家，依果、阆州，且织重绢，仍与作三等估。上估一贯一百，下估九百。待此法行后，每年两税一半与折纳重绢，即异人稍苏息，军用不亏”。^[27]这样，崔郾镇蜀后期，在地方百姓缴纳两税问题上，唐政府采取了折中的措施，蜀地以家庭织造为副业的百姓可以用质量较好的重绢来折纳两税的一半。百姓负担有所减轻，“蜀人便而谣之”，这是和崔郾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蜀期间，崔郾还注意西南边防，“抚驭两蕃，使之畏信不敢窥境。”这里的两蕃指的是吐蕃和南诏，二者是唐后期西南地区主要的边患，尤其是南诏。文宗大和三年（829年），由于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文儒自高，不练戎事”，疏于防范。^[28]且一心献媚敬宗，“贡奉相继，以固恩宠。以故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流闻于朝。”^[29]南诏遂乘虚大举进犯，攻陷了邛、戎、嵩三州，“入成都，止西郭十日……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30]其后，李德裕镇蜀，情况有所好转，“西拒吐蕃，南平蛮、蜑。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痍之民，粗以完复。”^[31]而崔郾镇蜀期间，持续了西南边境的稳定局面。

此外，崔郾还对蜀地迷信巫祝，广建神祠的风气提出了挑战。“前帅溺于巫祝，广置淫祠，窃帅之权，倾蜀奔奉，多因而有得，聚货如山。公皆发撤渚坏，戮辱窜弃，蜀人然后益敬公之德，知公之政矣。”这里的前帅指崔郾的前任李

固言，其在开成二年到会昌元年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而淫祠指供奉华山神的神祠。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李固言的神异故事：李固言元和六年落第游蜀时，曾遇一老妇，言其必当中第，二十年后将拜相镇蜀，还以其小女相托付。二十后李固言拜相后，老妇还登门探访，并再次以其女见托。之后李固言果然镇守蜀地，其卢氏外孙子九岁尚不能语。后李固言访得老妇之女巫者董氏，董氏使李祈祷华岳三郎，李固言如其所言行事，其外孙第二日早上果能言语。“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恃势用事，莫敢言者。”^[32]华岳三郎即华山神。在唐代，由于华山是唐玄宗的本命之山而受到崇奉，华山神被玄宗封为金天王，而华山神信仰在唐代民间也非常流行。^[33]尽管《酉阳杂俎》中李固言的奇遇并不可信，但李固言在蜀地信奉华山神以及巫者，上行下效，蜀地百姓崇祀华山神，祠庙广布，巫师因此聚敛大量财富的情况应该是当时实情。墓志记载，崔郸镇蜀后拆毁华山神庙，毁坏神像，并且诛杀流放巫者。这一点在《酉阳杂俎》中也有记载，“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责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趣。

崔郸从会昌元年十一月到大中元年，镇蜀长达六年，^[34]因此墓志称“终始六年，人人安业”。然而，其镇蜀的细节和政绩，传统文献记载却都失载，令人遗憾。近见卢华语等著《唐代西南经济研究》戊编十五章有《地方长吏与西南经济开发》，细致分析地方长官对唐代西南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却由于资料的局限而未涉及崔郸治蜀。^[35]因此，笔者在此特予彰显，希望有所补益。

据墓志记载“当大中皇帝临天下，改元之始，作镇淮海。”则崔郸于大中元年坐镇淮南。前面墓志首行称“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这是因为唐高宗年间升扬州为大都督府。唐后期置淮南节度使后，扬州为其治所。一般情况下，亲王为大都督、领节度使，而大臣为都督府长史、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任节度使期间，政绩也非常突出。“大率用蜀之治而加严饬，每以铲弊流惠为事，淮瀆之人乐而惧之，凡纷华盛丽，目为供使者一切斥而还官，繇是大治，五方

之人来之者如归市。”大中四年（850年）七月二十一日，崔郸薨于淮南节度使任上，享寿71岁。古人享年惯常用虚岁，这样，崔郸应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对于崔郸的卒年，史书记载语焉不详。《旧唐书·崔郸传》载“历方镇、太子师保卒”。《新唐书·崔郸传》载“宣宗初，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节度淮南，卒于军”。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二三载崔郸任淮南节度的时间是大中元年至三年。^[36]根据墓志，其节度淮南的截止时间当为大中四年，可补正。崔郸去世后，唐宣宗非常悲痛，辍朝二日，还追赠他大司徒。另外，崔郸的封爵是清河郡开国公。以上内容，两《唐书》俱失载。大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崔郸归葬于河南府偃师县。这里是崔氏家族的祖茔所在，据《崔陞神道碑》载崔郸之父崔陞去世后，“返葬于成周之偃师，从世墓也。”^[37]崔郸最终与先其30年去世的夫人卢氏合葬于崔氏祖茔之侧。

根据墓志记载，崔郸妻范阳卢氏，出身世家大族。崔郸有二子，分别是左拾遗崔璞、前京兆府武功县尉崔璩，二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失载，可补入。有女一人，嫁与范阳卢滔。从崔郸以及其女的婚姻来看，俱婚范阳卢氏。为其墓志书丹的从外甥郑洎也出自荥阳郑氏。^[38]无怪乎刘禹锡在《崔陞神道碑》中称“与姑姊李、范阳卢世为婚媾，入于姻党，无第二流，言门阀者许为时表”。可见及至唐后期，世家大族之通婚仍蔚为风尚。

墓志的撰写者是唐宣宗时期的宰相令狐绹。近年来，地不爱宝，洛阳地区先后出土令狐绹撰文的《孙简墓志》、《狄兼谟墓志》，均是鸿篇巨制，史料价值颇高。^[39]而《崔郸墓志》是最新出现的令狐绹所撰墓志文字。从墓志中令狐绹的语气来看，令狐绹与崔郸之间关系颇为亲近，二人有师生之义，令狐绹仕途中也受到崔郸的推荐和恩遇。因此，崔郸去世后，令狐绹受其子崔璞的嘱托，撰写墓志文字。墓志中高度评价了崔郸一生的人生轨迹，“外宽内严，出忠入孝，居常俨恪，如奉大祭，未始忤物，曾无谄笑。自被褐迫为公相，其道一致，可谓秉彝特立君子矣。所至府藏充溢，唯以上庆助朝廷，下拯救蒸黎为务，无枉费，无贿交。文擅国华，行冠人表。故处则玄衮赤舄，羽仪百工，动则琚戈淑旗，临长万

旅。公天伦六人，皆为名卿，多历显位，号文学之藪，标龙虎之望。一掌贡士，三开幕府，取士仅五十人，今布台阁者过半，率当时峻髦，《洪范》之五福，《商诗》之百禄，公皆得之宜乎哉。”由此而言，崔郾的确可以称得上当时世家大族的表率。从中不难看出，尽管到了唐后期，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门阀士族并非每况愈下，完全走向没落，他们在社会上仍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世家大族凭借深厚的家学传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积极的入仕，孝悌、严谨的家族门风，维持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而一些世家大族的言行也的确对当时社会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崔郾家族所代表的崔氏清河小房就是一个鲜明的个案。《唐语林》卷一就有这样的记载“博陵崔倕，缙麻亲三世同爨。贞元已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为宰相，五为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酆、外壶尚书郎郾、廷尉邠、执金吾郾、左仆射平章事郾。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尝叹曰‘崔郾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40]正因为如此，崔郾家族在唐代后期显赫一时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 [1] 何汉儒 《唐崔郾志探微》，《书法丛刊》2009 年第 1 期。
- [2] 林宝 《元和姓纂》卷三，第 331 页，中华书局，1994 年。
- [3] 《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表二下》，第 2729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 [4] 赵超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二，第 336 页，中华书局，1998 年。
- [5] 刘禹锡 《崔陞神道碑》，《刘禹锡集》卷三，第 38 页，中华书局，1990 年。
- [6] 夏炎 《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第 26～29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 [7] 《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第 4117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 [8] 《新唐书》卷一六三《崔邠传》，第 5016 页。
- [9] 赵超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二，第 365～366 页。
- [10]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 105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11] 赖瑞和 《唐代基层文官》，第 115 页，中华书局，2008 年。
- [12] 劳格、赵钺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八《司勋员外郎》，第 431 页，中华书局，1992 年。

- [13] 岑仲勉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第 60、6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 [14] 《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第 4119 页。
- [15]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第 2129 页。
- [16]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第 2121 页。
- [17]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第 5905 页，中华书局，1960 年。
- [18] 黄纯艳 《再论唐代茶法》，《思想战线》2002 年第 2 期。
- [19] 张泽咸 《唐代工商业》，第 39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 [20] 陈衍德 《唐代茶法考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 [21] 同 [18]。
- [22] 孙洪升 《唐宋茶业经济研究》，273 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年；李锦绣 《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二分册，第 833～83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 [23]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第 5906 页。
- [24]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第 5906 页。
- [25] 船越泰次 《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科及两税钱的折余和折纳问题》，《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 501～50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26]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第 2175 页，中华书局，1966 年。
- [27]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第 2175 页。
- [28]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南诏蛮传》，第 5284 页。
- [29] 《旧唐书》卷一六三《杜元颖传》，第 4264 页。
- [30]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中》，第 6282 页。
- [31]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 4519 页。
- [32] 段成式 《酉阳杂俎》续集卷二，第 215～216 页，中华书局，1981 年。
- [33] 贾二强 《论唐代的华山信仰》，《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 [34] 郁贤皓 《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二二，第 2959 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35] 卢华语等 《唐代西南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
- [36] 郁贤皓 《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二三，第 1682 页。
- [37] 刘禹锡 《崔陞神道碑》，《刘禹锡集》卷三，第 39 页。
- [38] 《旧唐书》卷一七六《郑肃传附郑洎传》，第 4574 页。
- [3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 70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赵振华 《唐狄兼谟墓志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 [40] 王说撰，周勋初校证 《唐语林校证》卷一，第 19～20 页，中华书局，1987 年。